

· 文学专业 ·



A SERIES OF BOOKS OF SUPERIOR MASTER THESES OF FAM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丛书

北京師範大學

卷

张 健 主编



山东友谊出版社

· 文学专业 ·

G643.8
10
:5

A SERIES OF BOOKS OF SUPERIOR MASTER THESES OF FAM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丛书

北京師範大學 卷

张 健 主编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卷 / 张健主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8

ISBN 7-80642-946-8

I. 中... II. 张... III.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汇编 IV. G64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0314 号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丛书

北京师范大学卷

张 健 主编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755 82098756

发行部 (0531) 82098035 (传真)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70mm × 230mm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张 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是全国最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之一。叶丁易先生与李何林先生为其重要的奠基者。它也是首批经国家批准的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点之一,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不但是其培养的首位文学博士,而且也是新中国国内培养出来的第一位文学博士。本学科点目前有博士生导师7人、硕士生导师12人;设有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戏剧影视文学等4个研究和培养的方向;在读研究生的总数为189人,其中博士生60人,硕士生129人。

新时期以来,本学科点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共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二十多个,出版学术著作五十余部,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教学奖励十余项。在鲁迅研究、茅盾研究、解放区文学研究、现代小说研究、戏剧研究、散文研究、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儿童文学研究等方面长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与此同时,还努力开拓着现代文学与现代性,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出版文化,汉诗研究,科幻文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增长点。

2003年我校撤系建院之际,在文学院新的架构之下,成立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其成员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学者求实、进取的精神,先后完成了“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近、现、当代文学课程一体化教改研究”、“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概论”、“中国现代喜剧史论”、“当代中国优秀儿童小说研究”、“中国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研究”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目前正在进行的重要科研项目主要有“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论辩史”、“中国现代文学的心理学研究”、“中国20世纪喜剧观念研究”、“当代北京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是一个研究型的学院,目前有9个博士点和12个硕士点,全院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接近2:1。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由于生源较好、导师较多,招生规模较大。在这种新的形势之下,学科点愈来愈意识到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我们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科研能力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和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本书编选的这五篇硕士论文,从不同方面展示了新世纪以来本学科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实绩。

杨志的学位论文《论古今山水诗的衰变》,在刘勇教授的指导下,打通了古代山水诗与现代山水诗的隔膜,以纵向的线性影响研究为主,同时辅以横向的中西比较研究,探讨了中国古今山水诗在体式、风格方面的流变,不但论析了中国古代诗人和西方诗人对汉语

现代诗的影响,而且探究了现代汉语诗歌新质生成的可能性。论文充分利用了古今中外山水诗的诗学资源,在对百年来中国现代汉诗创作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理解现代汉诗得失的诗学理论的新框架。应当说,这个框架似乎更为贴近诗歌的本体,对于中国现代汉诗的诗学研究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在邹红教授的指导下,夏敏的学位论文《楚文化情结与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一反关于郭沫若40年代历史剧创作功利价值方面的成说,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发掘出郭沫若历史剧融楚文化浪漫无羁的想象、激荡迷狂的情感和历史精神的理性把握于一炉的美学价值,从而确认了其对于中国话剧文学的历史性贡献。论文通过钩沉楚文化的精神气质,发现了深植于郭沫若历史剧当中“人神恋爱”、“献祭仪式”的“原型”以及“太阳崇拜”等文化基因。这一发现不仅对郭沫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目前仍然处于匮乏之中的中国话剧研究也不无启示意义。

少年小说研究是一个新课题。由王泉根教授指导、王永洪撰写的学位论文《八九十年代中国少年小说研究》,系统探讨了少年小说的文类特征、生成发展、主要类型及其美学流变。论文将它的生成与发展置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大环境中,全方位地考察了与其相关的理论与创作,宏观的梳理之中不乏微观的论析,历史事实的爬梳之中不乏富有新意的个性阐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长久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某种空白。

张琦和王远是我的学生。前者的论文《论90年代中国喜剧电影的新趋势》,遵循喜剧电影特有的规律,着力归纳分析了90年代中国喜剧电影新趋势形成的原因及其种种形态,努力探寻蕴含其中的文化意义与艺术价值,体现了作者对于90年代中国喜剧电影颇有见地的思考。后者的论文《试论市场化时代话剧的发展格局与整体趋向》,以世纪之交北京地区的话剧活动为个案,以实证研究为理论诉求,揭示了市场化过程对于话剧艺术和话剧生态的影响和挑战,其结论对话剧从业者和文艺管理部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尽管在那些职业研究者看来,上述论文难免带有稚嫩的痕迹,但是它们对于问题的敏感、对于成说的挑战、对于当下的关注、对于创造的期盼仍然值得我们感佩。它们的作者将会是有希望的一代学人。

近些年,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面临着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换。值此之际,山东友谊出版社不失时机地推出这套优秀硕士论文选,不仅有利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各高校之间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交流,可谓功德无量。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

本书的编选得到了刘勇教授、邹红教授、王泉根教授、张清华教授的大力支持,王金城教授、王者凌女士为我承担了不少事务性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2005年6月11日



总目

序/1 张 健

论古今山水诗的衰变/1 杨 志

楚文化情结与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47 夏 敏

八九十年代中国少年小说研究/87 王永洪

论90年代中国喜剧电影的新趋势/143 张 琦

试论市场化时代话剧的发展格局与整体趋向
——以世纪之交北京地区的话剧活动为个案/185 王 远

北京師範大學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论古今山水诗的衰变

作者：杨志

导师：

系别、年级：

学科、专业：

完成日期：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内容摘要：本论文以“大历史”为研究时段，以古代汉语诗歌、现代汉语诗歌和非汉语诗歌三个“板块”为研究视界，将“山水诗”置于古今诗歌的纵轴上（并在适当的时候置于中西诗歌的横轴上）进行比较，试图描述山水诗从古代汉语诗歌到现代汉语诗歌中的形态转变，指出这种转变的原因，进而反思现代汉语诗歌在形成中潜在的问题，追询它的新的生成之可能性。

在文章的结构上，本文分别从“山水诗的地位”、“山水诗的修辞”和“山水诗的结构”三个前后关联的方面进行论述，指出山水诗在现代汉语诗歌中的转变乃至退向边缘所具有的历史、语言和创作个体方面的原因。在进行以上描述和分析之后，本文在结尾讨论这种转变的影响，认为山水诗的衰微具有超出于诗歌题材范围的影响，威胁到现代汉语诗歌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加以注意。

关键词：山水诗；大历史；界限；经验感官；想像力

目录

绪论 “大历史观”和“界限”意识	5
上篇 山水诗的地位	9
中篇 山水诗的修辞	18
下篇 山水诗的结构	27
结语 山水诗的衰变之影响	37
参考文献	44
导师评语	45

绪论 “大历史观”和“界限”意识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受到了许多学术著作不同方面的影响和启发，现取重要的、与论域直接相关的列举如下：

其一，在古代诗学方面，有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叶维廉的《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和小尾郊一的《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和自然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宗氏对中国空间之文化特性的阐释，叶氏对山水诗之特性的分析以及小尾郊一对古代汉诗对空间景物处理技术之演变的描述，都富有启发性。

其二，在现代诗学方面，有于坚的《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李怡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修订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黄灿然的《译诗中的现代敏感》（《读书》1998年第5期）和《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读书》2000年3—4期）。于坚的诗歌理论乃是在对现代汉诗最前沿写作的思考中建构起来的，他在探讨现代汉诗的发展方向时，对古代汉诗的局限进行反思和清理，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尖锐性。李怡的诗歌理论采用“长时段”为研究视界，辨析现代汉诗对古代汉诗的传承与变异之关系，不限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具有全局性的眼光。黄灿然本人既是诗人，又是翻译家，主要从翻译的角度来思考现代汉诗的语言特色，准确、细致。

其三，在中西诗歌理论比较方面，有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余虹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对中西叙事诗论和抒情诗论的研究），刘小枫对人与文化之关系的论述，都启发了本文的写作。

但是，在进入正文之前，我还想先谈谈本文写作的思路和方法，以及在具体操作中产生的一些思考：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先生谈及他的“大历史观”：“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需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

①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269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② 在本文中，为了避免“新旧”二元对立中蕴涵的贬褒色彩，新诗统称为“现代汉诗”，旧诗则统称为“古代汉诗”。“现代汉诗”这一提法，诗歌理论界颇有争议，但是诗歌界争议反少——目前至少有两种新诗的民间刊物就叫做“现代汉诗”。

③ 侯马：《顺便吻一下》，第161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参见闻一多《唐诗杂论》（《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映，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① 我以为，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汉诗^②有一定的启发作用，那就是：在研究现代汉诗的时候，是否可以引进“大历史”的时段作为基点和视界，将现代汉诗置于横向和纵向的经纬之中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当前的现代汉诗研究往往局限于本时段里研究现代汉诗，或者单一地、局部地讨论古代汉诗对某一诗人或流派的影响。比较而言，一种宏观的、全局性的、长时段的“大历史”考察，显然具有它独特的优势。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时段的文学，它的生成和发展都必须包含三方面的行为：继承、移植和创造。继承本土文学的质料和形式，移植异质文学或者其他精神领域的质料和形式，结合前两者并依据生活经验和想像力进行综合创造。这三方面的行为实际上是难解难分地融合在一起的，这在我们这个多元文明相融合的时代尤其明显。诗人侯马就认为：“现代诗歌作者，需要懂中国的古典诗词，唐诗宋词中包含永恒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也需要了解至少10位西方诗歌大师的作品，其对心灵挖掘的深度必须严肃对待。要对中国新诗的来龙去脉，从白话诗到朦胧诗，特别是当代诗人的作品了如指掌。许多诗歌作者，对同时代的作品不闻不问，这不是专业的态度。”^③这段话不但适用于诗歌作者，也适用于研究者，它提醒我们：在现代汉诗研究中，需要注意古代汉诗、现代汉诗和非汉语诗歌三个“板块”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要注意现代汉诗的最前沿发展。钱钟书曾经在《围城》里揶揄新诗：只有做旧诗的人敢说不看新诗，做新诗的人从不肯说不懂旧诗的。但是，回望现代汉诗在20世纪的历程，它的这种自卑应该消失了。随着现代汉诗的逐渐成熟，使它增加了与其他板块“对话”的资格（所谓“对话”，即意味着独立的身份和交流的能力，两者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一个板块得以生存发展的两个方面）。今天，假如一个古代汉诗的研究者故步自封，对现代汉诗及其诗学理论的演变历程和最新进展缺乏明晰的了解，那么他对古代汉诗的认识和把握将是残缺不全的。这也就是闻一多在研究唐诗和冯至在研究杜甫的时候^④，比诸同时代其他研究者更有灼见的原因。

那么，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如何选择切入点呢？我以为，这需要涉及到“界限”问题。布罗代尔在他著名的《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

学》中即指出在“长时段”(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即源于此)研究中“模式”的作用:

照我的主张,研究应该不断地从社会实在中得出模式,再从模式回到社会实在,多次往返,耐心地进行修补。因此,模式就由说明结构的尝试、检验和比较的工具变成对某个结构的生命力和可靠性的验证。如果我从现实出发制造一个模式,我就会立即把它放回到实在中去,然后在时间中向上追溯,尽可能追溯到它的诞生为止。接着,我将根据其他社会实在的共时运动,估量这个模式可能的有效时限(即到该模式与实在脱节为止)。

他还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关注“界限”的重要性:“我有时把模式比做船只,一旦船只已经建成,我就要让船只下水,看它是否漂浮,然后沿着时间的长河顺流而下或者逆流而上。船只失事始终是最意味深长的时刻。”^⑤一个模式与其他模式之间存在着结构和系统的差异,虽然一些质料或者形式为各个模式之间所共有,但在不同的结构和系统中它们所处的地位并不一定相同。例如,在某一模式之中,某些质料或者形式占据重要地位,而在另外一个模式之中,这些质料或者形式则可能处于次要地位,甚至近乎消失。这些区别和断裂,便形成了模式与模式之间的“界限”。显然,从界限进入写作史,比从连续性进入写作史更能准确地把握实质性问题。

人进入这个世界是不由自主的,他不能选择自身的境况:历史、语言、文化、民族……但是不可说,人从此局限甚至附庸于其中。人的境况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的界限所在。这种界限,并不是不可以突破的。人生而具有的交流能力和创造能力能够不断越过这些界限,就像它们使人不断越出自身一样。人在与他人、文化、语言、世界等等的交往中不断更生,就像艾吕雅所说的:“我与一个个人握手,就像水不断流进不同的容器之中,在光辉灿烂之中变形”。我以为,这种“变形”是人生在世的意义之一部分,也是写作的意义之一部分。正如艾略特所一再强调的,任何一首杰作的产生都在撼动着、重新改写着已有的诗歌序列。^⑥任何一首杰作,它的意义既是朝向明天的,又是朝向

⑤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坛》,第195页-19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⑥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载《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昨天的。诗歌的使命之一,就是不断突破人类精神已经达到的界限,就是**界限之突破**。而我们不明白界限何在,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写作史的形态,更不可能尝试去突破它。

但是,对“大历史观”做一定的限定也是有必要的:

第一,我们需要保持对“历史”的批判意识。

在历史时间中形成的形态是一种“已然形态”,而不是一种“未然形态”。在考察它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美化或者神化它,视之为绝对完美的典范。我们不仅要试图发现写作史中的已然形态之间的局限,而且要注意到“已然性”中潜藏的“可能性”。对“意象”、“意境”、“言外之意”等历史中形成的公设观念,我们务必要进行检测,发觉它提出的前提,而不可以不加检讨地使用。

第二,对文化的“民族性”持谨慎态度。

如前所述,在具体的写作中,界限之突破乃是指向历史的界限、文化的界限、语言的界限,乃至全人类精神的界限。写作是追求精神自由和探讨人类创造力极限的事业,不可以用文化、语言、民族去完全限定它——虽然我们不可以无视它们的具体存在。我们尤其要警惕这样的命题:只有本文化所特有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或者对于那些“公认”的精华,我们的工作只是去证明它是怎样的优越。

第三,要将诗学理论和诗歌作品区分开来。

在研究诗歌的时候,一个常见的趋向就是将理论和作品随意混为一谈,随意地以此证彼,或者以彼证此,完全忽视了两者之间存在的“间隔”。例如,古代汉诗常常用来评判的“意境”、“情景交融”诸理论与其实践存在着脱节现象(本文将加以论述),上千年的论者却视而不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享誉千年的观点或诗学理论,并不能保证它的论述就是准确的,进一步去考察其中“间隔”的原因,才能够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整个写作史的形态及由来。因此,我们考察写作史的起点,首先应该放在作品上面,而不是理论上面。

本篇对从古代汉诗到现代汉诗的山水诗形态的考察,便是依据以上意图和方法进行的。我尝试将“山水诗”置于古今的纵轴上,并在适当的时候置于中外的横轴上进行比较,以试图描述山水诗在现代汉诗中的转变,指出这种转变的原因,进而反思现代汉诗在形成中潜在的问题,追询它的新的生成之可能性。

上篇 山水诗的地位

从古代汉诗转进现代汉诗，一个奇特的迹象是成功的山水诗大大减少了，尤其是：摹写景物的名句大大减少了，近乎无有。古代汉诗历来强调“景语”与“情语”的合融，山水诗或非山水诗中的写景句是其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像“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南朝·谢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唐·孟浩然），“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唐·王维），“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唐·李白），“迟日江山丽，泥融飞燕子”（唐·杜甫），“青草浪高三月渡，绿杨花扑一溪烟”（唐·张泌），“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宋·石曼卿），“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宋·梅尧臣），“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宋·苏轼），“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宋·陆游），“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元·杨载），“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明·高启），“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又着花”（清·顾炎武）等等，都是众口传诵的句子，哪怕人们记不住全篇。又如，冯至对杜甫诗歌成就的评价：

杜甫的诗反映了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的历史，描画了
祖国一部分险要的山川。^⑦

⑦ 冯至：《杜甫传》，第157页。

这一评价其实指出了古代汉诗中极重要的两部分：一是时代和历史，一是山水景物。在现代汉诗中，每每有称一位诗人是“五四的产儿”（如郭沫若），“时代的鼓手”（如田间），却从没有人称赞一个诗人的成就乃在“描画了祖国的山川”的。这种微妙的变迁，无疑有它的内在原因，值得我们加以注意。

那么，什么是“山水诗”？假若深入探讨它的定义，可能会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应该是共通的，那就是：山水诗首要关注的必然是空间。所谓“空间”，如海德格尔所述^⑧，我们不可以视之为一个纯物质的自然科学观念，或者亘古不变的客观容器，而应视为一个源自人

⑧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第一篇第三章《世界之为世界》，三联书店1999年版。

类生存的观念。它是受到来自宗教、政治、伦理等诸因素之影响而形成的，是一个历史性的观念。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所形成的以自然科学观念为根基建构的“空间”，我们也应视为一个新的历史性的观念。

这一观点并非海德格尔所独有。例如，宗白华就曾经接受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旧译：斯播格耐）的观点，将古中国的空间观念与古埃及、古希腊和现代西方诸文明社会的空间观念进行比较，通过揭示古中国的空间观念之特色，进而阐明古中国文化之特质。这种比较本身就说明了宗氏也认同空间的非物质性。^⑨但是，宗氏在讨论中将古中国的空间观念视为一成不变的整体，似乎没有意识到：在古中国漫长的时间里，空间观念是曾有过断裂和转换的。事实上，以魏晋南北朝为界限，中国的空间观念发生过一次相当大的整合与转换，而为宗氏所忽略。叶维廉即指出：“山水在古代诗歌里，在诗经、楚辞及赋里仍是做着其他题旨的背景，其能在诗中由陪衬的地位腾升为主位的美感关照对象，则犹待魏晋至宋间文化急剧的变化始发生。”^⑩日本学者小尾郊一亦明确地将古中国对自然的观念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断开：“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中国人的自然观似乎认为只有自然中才有美，才有安居之地，这种自然观实际上发生于六朝时期”。^⑪李怡则将古代汉诗划分为几个部分，其中之一的分界线就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⑫三者从不同的角度注意到了这一时期的巨大断裂性。实际上，宗白华是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古中国空间观念视为整个古中国的空间观念了。考诸他的论据，几乎全出自魏晋南北朝以下，就是一个明证。

那么，自魏晋南北朝以下的古代汉诗中的空间具有怎样的特色呢？我以为，这牵扯到形而上、政治和伦理等诸问题的合成。稍加注意的话，我们会发现，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中，在庄子、楚辞、古诗十九首中反复关注的生与死、有限与无限的时间性问题逐渐消失了，那样一种对生与死的形而上的焦虑和恐惧在以后的古代汉诗中再也没有如此深入的思虑、体验和追问过，而自然山水却在诗歌、绘画和游记中逐渐流行，人们在对空间的凝神观照之中，逐渐淡化了与时间相关的生与死的形而上焦虑。这两个时段潜在的因果关系，似乎还未为人道出。参之陶渊明的著名诗句：

⑨宗白华：《美学散步》，第95页-1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⑩叶维廉：《中国诗学》，第90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⑪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和自然观》，第3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⑫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修订本），第64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

“菊花”在魏晋时期被视为长生的药材之一。采长生之药材，视不朽之空间，其中关联耐人寻味。简略地说，“山水”在这一时段的语境中蕴涵着某种超自然的神秘色彩，并逐渐发展出一种与之相关的山水美学来，亦为近世以来高举“审美主义”对抗西方“宗教”的学者提供了依据。^⑬

其次，“山水”还涉及到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的空间划分。在古代汉诗中，山水／人世（“出世／入世”）的并列对峙是处处可见的，像“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等。这种对句赋予“山水”与“人世”相对立的空间意义。此外，古代汉诗历来就有“山水田园诗”和“边塞诗”的习惯性划分，前者显然具有家园、准乌托邦的含义，后者由于其所代表的人为、战争、文明异质性等含义只能归入“人世”空间。这些都说明了空间的非客观性。我们可以将古中国的空间观念与古希腊的空间观念略加比较。洪涛指出：“空间概念是我们理解古希腊城邦的关键。……城邦来自‘空间’概念，城邦的概念是理想的空间，是使人成为人的场所。……因此，空间的本质就是在其中被赋予了秩序。在希腊人那里，空间概念并不是中立的、客观的，而是伦理的。‘空间’就是人之为人的世界，是惟一的。城邦之外无所谓空间。因而，空间是有限的。所谓‘有限’是指它是有所规定的。只有有所规定的生活才是有序的，才是善的。希腊人厌恶无限，把有限同善等同起来。”“空间自身渗透着神性，从而使它与周围世界存在着尖锐对立，空间之外则是‘无’，这也就是空间的边界性。在希腊的传统观念中，无边界（无限）是恶的，这是因为边界就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可以被区分的前提。”^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在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空间分割是完全不同的。古希腊的空间分割为：“无”／“空间”（即理想城邦），古中国的则为：山水／人世。古希腊人的理想空间就是有限的城邦（对应于古中国的“人世”），古代中国人（魏晋南北朝以下）的理想空间则是广阔的山水乃至于无限的宇宙（对应于古希腊的“无”）。这种空间观念的区别不可避免地影响及诗歌本身。

我们的着重点不在于考察空间的形而上、政治和伦理含义，而在

^⑬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之《审美主义与现代性》一章。刘氏对“审美主义”论进行了强有力的批驳，但是，中国审美艺术中蕴含着形而上因素，恐怕是不能完全否认的。

^⑭洪涛：《逻各斯与空间》，第17页-18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